

光明书话

回归经

在一个远离经学的时代,曾经被奉为经典的“五经”,逐渐褪去了神圣光环,回归其历史、哲学或文学典籍的学术身份,加之现代学科分治,我们已然习惯将《诗经》看作先民歌谣,视《尚书》《春秋》为古史孑遗。

然而,一旦还原历史,不免会发现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经”以及由传述“经”而形成的“经学”,对汉代以后的学术、文化具有巨大的历史穿透力——文学自然也不例外。刘勰《文心雕龙》提出的“原道”“宗经”之说,正是经典的理论概括。所以,读到刘运好教授三大卷新著《魏晋经学与诗学》时,一个尘封许久的学术论题突然又鲜活地呈现在眼前,那就是——回归经学的视野来审视诗学。

项念东

回归经学的视野,首先必须承认经学而非其他乃是中国两汉以后学术史的主干。

讲论学术史的人常有一个话头,即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加上清代考证学,构成一部中国学术史的基本框架。“一代有一代之学术”,俨然成为学术史发展的一个规律。但是,如果顺着中国学术的“原有脉络”来看,两汉以下,不论儒学以何种面目呈现,道家道教的思想如何发展,佛教禅宗又以怎样的进程影响到中国思想,经与经学,始终还是贯穿中国学术发展史的主体形态。只不过,玄风煽煽、佛法昌明,抑或天理人心之辨、名物训诂与大义微言之争,作为曾经某一个历史时期的“学术新潮”,或多或少会遮蔽经学本应有的地位。



《魏晋经学与诗学》刘运好 著 中华书局

1902年3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半月刊)上开始陆续发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其中就提到,三、六、九、道、家言猖披时代,乃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思想最衰落之时代。稍后,以经学家而讲学,相垣的皮锡瑞也在《经学历史》中把魏晋六朝视为“经学中衰时代”。尽管后来的学者未必都这么认为,但指出“旧”“新”交替之际的复杂(如汤用彤《魏晋思想的发展》),或如白华所说,“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而“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但魏晋时期的儒学尤其是经学化儒学,确实被低估了在思想史上的发展地位。所以,《魏晋经学与诗学》开篇即指出:“本书开宗明义:魏晋并非‘经学中衰时代’,而是经学发展的第二个繁荣期。”(《弁言》)作为直接的证明,就是全书以逾30多万字篇幅钩沉史料而还原出的一部魏晋经学发展史。为了辨析这一非成是学术公案,作者的魏晋研究,既有宏观上的整体考察,发掘各个历史时段经学成就、发展特点及其生成动因;又有微观上的个案剖析,通过详细论证产生于魏晋时期典型经学著作,为宏观观察提供范例上的支撑;而且还毫不吝篇幅,钩沉考索,专列“魏晋经学著作一览表”,将可考的656种魏晋经学著作一目了然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在“魏晋经学的整体考察”中,作者曾不无自负地结论道:“魏晋经学‘中衰’说的终结。”我相信,作者的结论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学术判断:魏晋经学更多是“作为一种普遍性的思想价值体系,渗透、影响到诗学之中”。也就是说,相对前代,乃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思想最衰落之时代。稍后,以经学家而讲学,相垣的皮锡瑞也在《经学历史》中把魏晋六朝视为“经学中衰时代”。

其实,早在百年之前,冯桂芬即提到,“如后世之言诗,止以为吟咏性情之用,圣人何以与《易》《书》《礼》《乐》《春秋》并列?谓可被管弦、荐寝席,而变风、变雅又何为者?尝体咏群经而始知,诗者,民风升降之龟鉴,政治弛张之本原也。”(《校邠庐抗议·复陈诗议》)倘若衡之以现代文学理论教科书的界定,冯氏之说不过是陈旧的传统诗论的延续。然而,经学视野中的诗学,从来就不只是审美的,更担负着社会生活中价值判定的职责。

当然,回归经学视野审视诗学,并不回避魏晋玄学、佛学与诗学的内在关联。准确地说,作为一种新的思想资源,魏晋时代的玄学与佛学深深影响到中国诗学的理论形态与美学品格。得意忘象的哲学思辨、题名任运的精神追求、象外之谈的审美转换、文外之旨的诗学生成等等,从王弼、嵇康、郭象、陆云、张湛,到支遁、道安、慧远、僧肇、僧叡,一系列思想史个案的诗学观照,构成全书对魏晋诗学新的思想触发点的分析图谱。

作者学术视野是宽阔的,更重要的是,他不断提醒读者注意思想学术的“复杂”。这既符合学术史、诗学史的基本生态属性,实际上也给学界的进一步研究预留了宽阔的“空间”。这也不免令人想起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新理论的同化需要重建先前的理论,重新评价先前的事实,这是一个内在的革命过程,这个过程很少由单独一个人完成,更不能一夜之间实现。”(《科学革命的结构》)思想的从来不是非一蹴而就的,其内在的复杂性,尤其是其诸要素的相互纠缠往往更能见出思想史的本来面目。应该说,《魏晋经学与诗学》对魏晋儒学与玄学、佛学等思想资源内在纠缠关系的分析,尤其是所提示的问题意识,无疑是值得思考的,也是极其有趣的。

我常常在想,书对于我们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是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还是打开思考之门,获得走出思想蒙昧之地的启示?应该都有,而我也更喜欢后者,所以读刘运好教授这部三卷本的著作,关注的也正是这一点。(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共和国脊梁”的故事

韩启德



钱三强与何泽慧(左)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波澜壮阔,亿万人砥砺前行。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和带领下,中国人民谱写了一部追求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的辉煌史诗。在这举国同庆的日子里,我们不能忘记,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伟大征程中,始终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或许没有直接参加民族解放的斗争,但他们为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他们或许没有在战场上抛洒热血,但他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提供了最可靠的保障;他们或许没有活跃在国际关系的舞台上,但他们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争得了最充足的底气。在实验室里、在课堂上,甚至在工厂和田间,他们专心致志、日复一日,用智慧和心血书写着属于中国的科学故事。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科学家。

当我们去勾勒这一群体的塑像时,会发现,无论是那些百年前最早举起“赛先生”大旗,将现代科学引入中国的老一代科学家,还是在新时期正创造着共和国科技新辉煌的当代科技工作者,身上都闪烁着宝贵的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科学家精神。伟大的时代需要这样伟大的精神。今天,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担当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时代使命,亟须在全社会加快培育促进科技事业健康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激励更多人追求真理、勇攀高峰,激励更多人开展自主创新、开发核心技术。

宣传和弘扬科学家精神、培育科学文化土壤,是时代交给我们的重大命题。值此新中国70华诞之际,我们欣喜地看到,一套用中国的语言、以具有中国画法特点的图画讲述中国科学家故事的绘本丛书出版了。“共和国脊梁”科学家绘本丛书以高度中国化的表现形式,讲述了八位中国科学家的故事,体现出科学家精神深厚的教育价值和面向未来的现实意义。

2 科学家故事是科学家精神的重要载体

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科学家精神,提炼自千千万万科学家的科研和教学实践,却不应脱离于实践,变成抽象的概念。我们提出科学家精神,不是为了创造概念,而是为了指导实践。因此,我们讲述和阐释科学家精神,也就不因应仅仅用概念解释概念、用理论阐释理论,而应立足实践,讲好故事,让科学家精神真正有骨肉、有血脉、有情怀,让脱胎于实践的科学家精神最终归于实践。科学家故事,是科学家精神的具体化和人格化,也是科学家精神最有说服力的载体。

“‘共和国脊梁’科学家绘本丛书”讲述的正是这些生动鲜活的故事。

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是青年何泽慧以纤弱之躯回弹道学,抵抗侵略者的决心;是已成为世界著名科学家的钱学森冲破重重阻挠、放弃优渥生活,毅然返回祖国参加国防建设的选择;是袁隆平为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矢志研究杂交水稻,在祖国的田间地头留下的足迹。

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是何泽慧在显微镜下观测到的重核裂变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是刘东生走遍祖国的黄土区域进行科学考察,提出的“新风成说”;是梁思礼从“东风”到“长征”的火箭征程。

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是竺可桢数十年如一日为大自然写下日记;是屠呦呦从2000多种中药中提取青蒿素经历的数百次失败;是吴征镒用十年时间整理出的三万张植物卡片。



中国工程院院士、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是92岁高龄的何泽慧每天背着双肩包去上班;是年近九旬的袁隆平仍然在稻田里奔波;是屠呦呦在身披巨大荣誉后继续开展的青蒿素研究。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是60多家单位、数以千计的科研工作者参与的523项目,艰苦攻关13年,找到了抗疟新药青蒿素;是无数科技工作者隐姓埋名、投身戈壁,付出青春甚至生命的“两弹一星”,铸就大国重器,奠定国防基石;是80多家单位、300多位作者、160多位绘图者,历时45年编纂的《中国植物志》。

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是钱学森自编教材给学员上课;是竺可桢培养的我国第一批气象学家;是吴征镒在获得国家最高科技

奖后的感言:“我愿做垫脚石,让后人继续攀登高峰。”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这样的故事还在继续。一代又一代中国科学家传承不息、奋斗不止,坚持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将现代科学与洗刷民族屈辱、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目标紧紧连在一起,把自己的人生构建于时代大背景下,着力攻克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前沿难题和核心技术。科学家精神之所以成为一种精神,也正在于其融化在一代代中国科学家的血脉中,世代传递、绵延不断。为社会公众讲好科学家的故事,才能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崇尚创新、尊重人才的浓厚氛围;为少年儿童讲好科学家的故事,才能引导他们热爱科学、献身科学,为中国科学作出贡献。

3 用中国的语言和艺术讲述中国科学家的故事

“共和国脊梁”科学家绘本丛书“最大的特点,在于其原创性和中国化。由中国的作者和绘者创作,绘图风格具有中国画法特点,讲述中国科学家的故事。绘本涉及的八位科学家,无不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作出过重要贡献,他们所展现出的精神特质,也具有显著的中国科学文化特点。这就使得整套丛书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在用中国语言、讲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精神方面,不失为成功的尝试。

我最初接触这套绘本是“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首席专家张黎教授交给我的草稿。依托采集工程,从2017年策划至今,这套绘本的创作历时两年有余,经过数次修改,力求在内容准确、史实无误的前提下,贴近读者尤其是青少年的认识水平和理解能力,做到有趣、可读,让中国科学家的故事走近他们,发挥榜样的作用。

采集工程由中国科协联合中共中央组织部、教育部、科技部等

12个部委共同实施,启动于2010年,至今已逾10年,已采集500多位科学技术专家,获得了数万小时的访谈音视频和20余万件手稿、书信等数字化资料,为研究共和国科技发展历程积累了大量历史资料,为深入挖掘和研究中国科学家的科学与人文精神提供了丰富而独特的案例。

“共和国脊梁”科学家绘本丛书“是采集工程在公众宣传领域作出的一次全新尝试。有写作经验的朋友大概可以认同:在可以罗列很多材料、长篇大论的时候,说明一个问题或讲述一个故事,并不难;而要用简单的语言讲述复杂的故事,三言两语间传达出丰富的精神,非常困难。这套绘本丛书所做的,就是这样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丛书文字作者以采集工程学术团队的科学史研究者为主,保证了丛书内容的可靠性。在创作过程中,作者团队与儿童文学作家、绘本研究专家、著名绘本作家的多次研讨,反复修改,才形成了最终

的文字稿,使绘本文字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丛书各本的绘画风格大体统一,又各具特色,《折纸飞机的小男孩》充满童趣,把钱学森这样一位大科学家描绘得可爱可亲;《第191号的发现》以写实手法,描绘屠呦呦带领团队提取青蒿素的过程,色调古朴;《植物的好朋友》用彩色铅笔细腻地呈现出了各种植物;《中国第一代航天员》在写实的基础上充满想象力,还隐藏了13颗星球在画面中;《揭开黄土的奥秘》开篇大气磅礴,将一位老人“嘘!”的动作融在黄土高原里,十分巧妙;《中国的“居里夫人”》结尾用不同时期何泽慧的形象来烘托,富有诗意……

总而言之,“共和国脊梁”科学家绘本丛书在讲中国科学家故事方面,作出了有益的尝试。未来,期待读者通过这样触手可及的方式了解科学家、了解科学家精神,成长为创新社会的栋梁。(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协名誉主席)

1 弘扬科学家精神刻不容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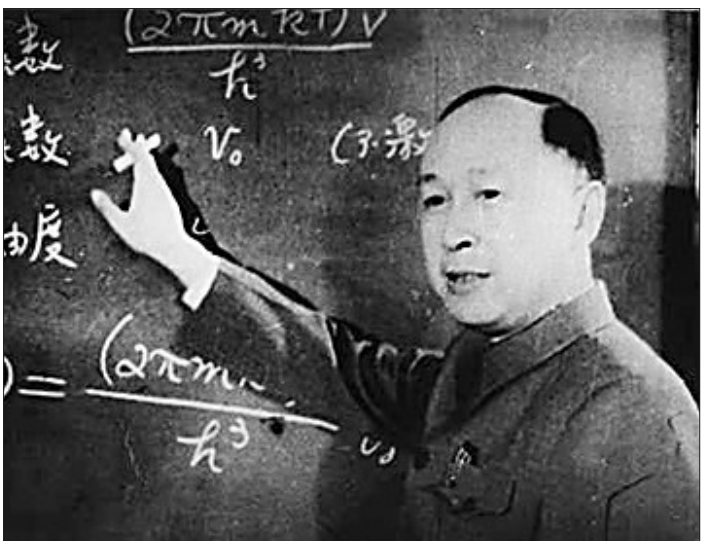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技事业取得的成绩举世瞩目,但差距和问题也很明显。我国基础研究短板依然突出,重大原创性成果缺乏,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中国已然称得上科技大国,但还谈不上科技强国。当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地需要科学文化建设和科学精神的弘扬。今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 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以塑形成科学家精神为抓手,切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积极营造良好科研生态和舆论氛围”。

弘扬科学家精神有利于建设创新型国家。求实创新是科学家精神的重要内涵,也是现代科学技术不断发展进步所依赖的基本精神。对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的认识和理解不足,是近代中国科技落后的重要原因,也是制约当代中国科学技术自主创新和健康发展的因素之一。弘扬科学家精神,增进公众对科学的理解,是以创新引领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创新是国家命运所系、发展形势所迫、世界大势所趋,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快建设创新型国

家,刻不容缓。

弘扬科学家精神有利于培育科学文化。科学家是科学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和践行者,科学家精神是科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科学文化特点的重要表现。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近代以来饱经患难民族命运,形塑了中国科学文化的重要特征。中国知识分子正是在接受、传播和弘扬这种科学文化的艰难历程中,塑造了极其深远的集体感受、民族意识和家国情怀。也因为如此,爱国、奉献、协同、育人等精神,才能成为科学家精神的重要内涵。弘扬科学家精神,有利于培育科学文化,加深公众对科学的理解,以科学精神激发创新活力和潜力。

弘扬科学家精神需要多样的形式。弘扬科学家精神是一个广泛的命题,在科技界改进学风、营造良好的科研生态固然是其最重要的题中之义;在全社会优化科技生态、改善科技创新的舆论环境,培育尊重科学、崇尚科学的社会风尚,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弘扬科学家精神需要更多样的载体形式、更广泛的传播方式,触及更广泛人群、产生更强影响,发挥更大作用。



工作中的钱学森